

《南京照相館》與《731》：兩部抗戰電影如何重塑中國的創傷歷史記憶？

在中國，二戰期間日軍在華暴行的記憶，始終是民族情感與歷史敘事交織的敏感地帶。每當相關事件被重新提起，往往會引發新一輪關於歷史創傷與民族情緒的輿論浪潮。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南京大屠殺」和侵華日軍731部隊的細菌戰。

今年夏秋的中國院線，兩部講述這段歷史的電影成為焦點。7月底上映的《南京照相館》在不到20天內錄得中國官方統計的逾20億人民幣票房，成為暑期檔最熱影片。而另一部《731》則一度被指因內容過於殘酷而延後上映，將在9月中旬登場。

在二戰結束80週年紀念日到來之際，兩部話題之作的推出時機不無象徵意味。中國也不掩飾其歷史記憶講述背後包含的政治意義：《人民日報》評論稱《南京照相館》是以「情感互觸」喚醒歷史記憶以及年輕一代的「時代責任」，而《731》更是由東北多個省市宣傳部參與製作，政治訊號更為直接。

這些電影承載的不僅是對殘酷戰爭歷史的回望，也是當代中國如何向新一代觀眾講述和處理這些集體記憶的信號。

主旋律對抗否認主義

「這些電影常有『主旋律』特性，」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中國文化學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向BBC中文表示，「不僅是娛樂作品，也被當作民族主義宣傳與教育工具」。

這位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指出，數十年來中國拍過多部講述南京大屠殺的主流電影，而這最新一部本質上是在沿用既有套路：以照片作為核心，透過虛構角色保存證據，從而向世界證明歷史的真實性。

《南京照相館》的故事線取材自大屠殺期間的兩名年輕中國人羅瑾和吳旋冒險保存日軍暴行照片的真實事件，敘事結構延續自1987年的電影《屠城血證》。兩部電影中，兩個真實人物都被虛構的多人角色取代。

「為什麼這麼多電影都執著於證據？」白睿文說，「很大原因是多年來日本方面多次否認南京暴行。」

從1990年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稱南京事件為「捏造」，到2023年日本高級官員試圖否認大屠殺的存在，多年來日方的每一次否認都會激起中國方面的強烈反應。白睿文認為，這促

使了這些電影總在反復強調證據。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我覺得這個趨向蠻悲哀，」他說，「好像在中國，南京大屠殺的整個文化論述有點走不出日本人否認的陰影。」

他表示，這種對證據的執著，陷入了「日本否認主義與中國證明之間的惡性循環」。

《南京照相館》上映後，日本有媒體和網民批評其渲染日軍暴行、煽動仇恨，並指控是「中國官方支持的反日宣傳」。《731》原定7月上映，但在傳出家長聯名抵制和日本外務省多次抗議等消息後延期，最終由《人民日報》宣佈定檔9月18日上映，那是中國東北抗戰的紀念日。

歷史記憶的複雜性

歷史學者也表示，日本右翼對歷史的否認，強化了南京大屠殺等事件在中國抗戰敘事中的重要性。

「我本人是上世紀60年代在南京出生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楊大慶向BBC中文說，他童年時並不經常聽到南京大屠殺，但是自1980年代初報道了日本教科書刪改侵華戰爭內容開始，相關歷史問題就變得非常敏感，加上後來有日本首相等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等爭議，日本政要公開否認侵略戰爭等爭議，更使日本侵華暴行成為中日關係的一個癥結。

研究二戰歷史及日本戰後與東亞關係的楊大慶表示，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暴行的真實性已獲得主流學界的廣泛認可。現存的細節爭議可能更多地反映歷史記憶的政治性。

經過近幾十年的史料發掘和學術研究，包括日本學者在內的全球多數歷史學者普遍接受南京大屠殺是一場大規模，有組織的戰爭暴行這一結論。但日本的否認派則經常試圖轉移視線，質疑最初戰後南京國民政府提出的30萬死亡人數。楊教授認為，死亡人數當然重要，但比起精確數字，為什麼發生如此大規模，有組織的戰爭暴行是更值得共同思考的問題。

「從根本意義上講，命令和實施南京大屠殺的，不是野獸，是人……他們穿起軍裝後，走上戰場，人性為什麼漸漸喪失了？」他說。對731部隊的研究亦然：「為什麼研究科學的人會跨越紅線，慘無人道地把其他人作為試驗品？我覺得這些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然而複雜的歷史與人性問題，在具有宣傳色彩的電影中往往被簡化。日本人角色往往被描繪成單一化的加害者，少有對其行為背後結構性問題與心理變化的探討。

白睿文指出，這種處理並非是中國獨有。「我認為這類戰爭電影通常都會淡化『敵人』的視角，將敵人非人化，」他說，即使是好萊塢也鮮少有例外——像克林特·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奇連伊士活）的《父輩的旗幟》和《硫磺島的來信》那樣分別以美日雙方視角各拍一部電影的做法「相當罕見」。

他表示，2009年的《南京！南京！》曾試圖打破這種框架。該片採用多視角的敘事，其中一個日本兵角色在道德上有內心矛盾衝突，導演陸川甚至設計了該角色阻止同伴強暴一名女性。

白睿文認為，這種人道主義視角似乎令該片更容易被中國以外的觀眾接受，但在中國國內卻遭受詬病。「如果你在中國採取道德模糊的路線，觀眾會批評你不夠愛國。」他說。

看電影的下一代

《南京照相館》上映後票房大賣，中國媒體報道指觀眾觀影後「陷入沉默」，影片的克制敘事與情感共鳴獲高度評價。電影在貓眼平台評分高達9.7，而尚未上映的《731》則已有逾410萬人標記「想看」。

然而，電影熱映也引發「仇恨教育」爭議。「我們沒資格替先輩原諒日本」等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出現，短視頻平台亦流傳大量兒童觀影後情緒激動的畫面。其中一條影片中，一名小女孩在影片結束後哭著說「要把日本人都殺了」，其母親附和：「現在知道日本有多壞了吧？」該影片疑似之後被撤下。

另一條瘋傳的影片中，一名5歲女孩觀影後情緒久未平復，泣不成聲地問家長：「中國人現在強不強……」

學者指出，中國電影缺乏分級制度，使這類電影進行民族主義與歷史教育時會面臨挑戰。「如果你了解南京大屠殺或『731』，你就知道這些題材不適合兒童，」白睿文說，「南京大屠殺的英文翻譯叫『The Rape of Nanjing』，它不只是比喻。」

他表示，《731》甚至會更令人擔憂，因為那是「最恐怖的題材之一」——「非常血腥……也可能激化中日關係」。他認為影片延期

可能與這些審查考量有關，如何在主流電影中呈現此類題材，實現其「宣傳價值」而又不陷入黑暗，是一大挑戰。

受訪學者均表示，如今的一代生活在戰後80年，對那場戰爭有親身體會的人大部分已離世，選擇以什麼方式將中國人在20世紀所承受的苦難記憶傳承下去，將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課題。

白睿文認為，在中日關係緊張時，這一類題材的電影常常會被重新拿出來當宣傳用，所以對於當前和今後的中日關係，這些電影肯定會發揮政治作用。

同時，他補充表示，這一類電影在「愛國教育」和「仇恨教育」傳統起了一定作用。當國內有不穩定的社會現象——比如失業率高等問題，這種電影也可以起「轉移注意力」的作用。

中國國防部在最近談到《南京照相館》時，強調相關歷史「不容忘卻」和「不能重演」，中國將以「更強大的能力」和「更可靠的手段」捍衛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中國將日本歷史罪行轉化為民族情緒和外交籌碼並非新鮮事，而歷史學者表示，這在網絡時代可能面臨新的挑戰。

「在網路時代，過激的言論往往會更惹人注目，甚至贏得喝彩，」楊大慶說，而他擔心，現代人如果不了解歷史研究的成果，「是不是很容易把網上或者電影院裡看到的歷史，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就當成了真實的歷史」。他認為電影激發的愛國情緒有其意義，但是希望新一代不會僅僅從這一個角度去看待歷史事件，而是從深度廣度去思考歷史。

此外，他還認為這段些歷史記憶還藏著另一個重要課題。

「日本當時在中國犯下包括細菌戰，屠殺戰俘的各種戰爭暴行，一個重要原因是它作為亞洲最強的國家，覺得對於當時中國這樣的弱國不需要接受國際法律和倫理的約束，」楊大慶說，「作為一個漸漸變成世界強國的國民，應該從歷史中得到什麼樣的經驗教訓？」

「『自強』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時代口號，」他說，「但是自強了以後怎麼辦呢？」

他覺得這是留給下一代的新課題。(BBC)

「丹麥辛德勒」：日軍燒殺姦淫 丹麥人辛德貝格英勇救人

1937年，南京淪陷。貝恩哈爾·辛德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和友人一起設法收容庇護了約2萬名中國人。

2019年8月31日，中國媒體報道《貝恩哈爾·辛德貝格：南京的“丹麥英雄”》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開展。

同一天，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在奧胡斯為一尊3米高的辛德貝格銅像剪彩。那是辛德貝格出生的城市。銅像是南京送給奧胡斯的禮物。

奧胡斯市檔案館館長索倫·克里斯滕森對辛德貝格的評語：一個在貧困中默默無聞地死去的人，實際上可能是我們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

哥本哈根大學跨文化與宗教研究系研究員彼得·哈姆森（Peter Harmsen，中文名何銘生）去年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說，奧胡斯不久將為辛德貝格豎起紀念碑。

辛德貝格被稱為丹麥的辛德勒。後者從納粹手中救了無數猶太人的命，事蹟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辛德勒的名單》。

1937年冬~1938年春，辛德貝格與德國人卡爾·京特等人一起在南京遠郊的江南水泥廠收容了1.5萬至2萬名難民，建了難民診療所（辛德貝格小醫院），選用圖文記錄了日軍的暴行。丹麥學者估計獲救人數為6千到1萬人。

BBC記者勞倫斯·彼得（Laurence Peter）梳理史料，回顧了辛德貝格當年的大智大勇。

南京淪陷

日軍在南京城裏燒殺姦淫長達6周，據估計30萬人死於南京大屠殺，其中包括許多婦女兒童，被強姦的婦女估計約2萬人。

日軍暴行不僅有中國目擊者、倖存者的記錄，像辛德貝格那樣當時在南京的西方人也保留了大量圖文記錄。

迄今為止日本仍有政客否認發生過大屠殺，否認中方所說的死亡人數。這是中日關係的一個緊張源。

南京被日軍攻陷時，辛德貝格26歲，在丹麥公司建的江南水泥廠受僱不久，工作是門衛。他有一個德國人同事，卡爾·金特（Karl Günther）。

辛德貝格和金特設法搭了一個避難所和一個診所，收留了大量中國難民。

辛德貝格在水泥廠樓頂用顏料畫了巨大的丹麥國旗，以免遭日軍轟炸。

他和金特還在水泥廠周邊掛上丹麥國旗和德國納粹旗。

《奧胡斯教區時報》1938年3月6日發表《最大的丹麥國旗飄揚在中國南京》報道，其中引用了辛德貝格的一段話：「我在廠裏升起

了一面在中國最大的丹麥國旗。我還讓人在廠房屋頂上用油漆繪出一面約1350平方米的丹麥國旗，從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這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面丹麥國旗。」

當時，日本跟納粹德國和丹麥屬於友好關係，因此日軍對這個地方不敢造次。

研究辛德貝格的丹麥學者何銘生（Peter Harmsen）說，戰爭爆發前，辛德貝格真的就是個不能再普通的無名之輩，沒有任何特別之處。

「他身高1.72米，就是1930年代丹麥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他在學校成績一般。」

「但是，1937-1938那個黑暗的寒冬，他變了。面對日軍的殘忍，他決定採取行動。」和辛德勒一樣，在被救助的人眼裏他是了不起的。

2006年4月，辛德貝格的妹妹比滕到南京，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贈一批文物，其中有一條絲綢感謝狀，題頭繡著「辛佩先生惠存」，正文是「見義勇為」4個黑色大字，落款是11位中國人的姓名。辛佩是中國難民對辛德貝格的稱呼。

倖存者記得

當年15歲的周仲兵（音）是倖存者之一。他說：「當時有一個丹麥人設的避難所，外面有人站崗，還有人巡邏。日本人去找麻煩時，丹麥人就出去攔住他們。」

何銘生援引的另一名目擊者叫郭十妹（音），農婦，1937年時25歲。

她說：「日本人到避難所門口時，那個外國人（辛德貝格）就走出去跟他們交涉，說一會兒話，然後日本人就走了。」

「要是日本人來找女人，那個外國人就拿出（丹麥國）旗子，跟他們說幾句話，然後日本人就走了。」

辛德貝格曾在給友人的信裏描述目睹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時的震驚：「到處都鮮血橫流，你根本無法想像。從8月份以來，我有充分的機會研究戰爭的恐怖。血、血，更多的血。」

辛德貝格

辛德貝格教育程度不高，十來歲就輟學，跟著遠洋輪出國，在船上打雜為生。

1931年，他加入法國外籍軍團，沒過幾個月就當了逃兵。

據他的外甥女對中國媒體透露，辛德貝格從法國外籍軍團當了逃兵後，一度被當局通緝。

1934年，辛德貝格到了中國，曾給英國駐華記者菲利浦·史蒂汶斯當司機。

1937年11月，日軍攻打上海，史蒂汶斯在

火線報道時被日軍機槍射中身亡。

日軍攻入南京前不久，辛德貝格剛在江南水泥廠找到門衛的工作。

他在南京時間不長，但記錄了大量日軍暴行，還把報告交到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1938年第24屆國際勞工大會上，辛德貝格放映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南京委員會主席、美國牧師馬吉拍攝的日軍暴行影片。

辛德貝格1939年離開中國，輾轉前往美國，加入了美國商船隊服役，退役後定居加利福尼亞，終身未婚，1983年去世。

他生前極少談及早年在南京目睹的慘絕人寰的情形。但他當年的勇氣和義舉不會被遺忘。

丹麥女王瑪格麗特2011年訪華，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時手裏拿著黃玫瑰，就是以辛德貝格命名的「永遠的南京·辛德貝格玫瑰」。

何銘生對BBC表示，辛德貝格向中國難民打開了一扇門，從另一層意義上講，他也打開了一扇通向自己靈魂的門。

「這就使辛德貝格的故事具有了普世的意義。它觸及極端環境下人何以為人的問題。」他說：「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幸運的，永遠

不必經受那樣的考驗。辛德貝格別無選擇，但他通過了考驗。」

如果處於類似境地，我們每個人會如何反應？(BBC)



貝恩哈爾·辛德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揮舞丹麥國旗，把日軍擋在避難所外



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2011年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玫瑰以辛德貝格名字命名。